

國立中央研究院
社會科學研究所

叢刊

第十九種

中國棉業之發展

嚴中平著

商務印書館印行

題 記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太平洋國際關係學會致函本所，委託本所作中國棉紡織業之研究。此時，英美諸國，棉業蕭條已久；遠東市場，日貨汎濫不已；中國正處於嚴重的經濟恐慌之中，棉業衰敗尤甚。本所對此富於國際競爭性之產業部門，正予以深切的注視，遂欣然接受委託，決由王子建先生及作者合力進行研究。

學會原意，在比較太平洋關係各國之棉業現狀，預計於二十八年九月第七次大會上提出討論，故凡會員國家，皆受委託，作同一性質之研究。惟學會知中國尚有大量手工業之存在，特指定中國報告書應別列手工業一章，作為附錄。本所計劃，即由王子建先生擬定，計分原棉，紗廠，成本，勞工，貿易，手工業各章，初未嘗料及寫成今日之體列。

我們初意：研究取材，必以親歷調查為主，以綜錄他人記載為輔。預計以十八個月的時間，對全國重要紗布廠作一精密的考察，同時并旁及棉花之生產及花紗布之運銷諸問題。二十六年春，作者首赴江蘇南通作手織業調查，子建先生則留所策劃一切。八月初，作者事畢返所，旬日後，上海戰事即行爆發。其後，此至饒興趣之棉業問題，遂祇能從故紙堆中鑽研，無復親歷調查的機會；且隨戰事推移，研究工作又祇能在道路流徙，警報頻傳聲中進行。

滬戰發生後，作者即離所，同年十二月奉召返所時，所址已自南京遷往湖南長沙與南嶽。作者到所，未遑執筆，旋又奉令再度遷徙；且為運輸事，輻延衡陽全州旅舍中，為時達三個月之久。二十七年四月起，作者抵廣西陽朔新址開始工作，其後半年內，除因病輟工半月外，一切尚能勉強進行。此期計由子建先生寫成紗廠一章之大部分，由作者寫成手工業一章及貿易一章之一部。

二十七年九月間，華南華中戰事同告失利，本所奉令作第三次遷徙，前往昆明。於是裝箱候車，賃屋佈置，停止工作三月有餘。不料昆明工作纔

二三月，子建先生即因公赴滬，所遺一切，全成爲作者一人的負擔。彼時子建先生之紗廠一章（包括勞工成本兩節在內），業已完稿。繼之，作者亦續成貿易及原棉兩章。至二十八年五六月間，中文稿可謂已大體備就。不過修飾整編，尚須若干時日。

對於棉業問題，作者私心偏向於歷史的研究。已成原棉、貿易、手工業各章，詳於現狀（二十七年前五六六年間）之描寫，亦頗涉及歷史的記載。全稿大體寫就時，吳半農先生已改作國營事業之研究，翻譯工作，不能兼顧，如期提出報告的計劃，實已無法實現。更鑒於我國紗廠棉田，多已毀於敵火，或淪入敵手；世界戰爭，又迫在眉睫，事實上，國際棉業之比較研究，已失其意義，故已成稿件之橫的寫法，殊屬枯燥乏味。爲此，作者乃決心全部改寫。

改寫計劃經陶孟和先生核准後，作者立即開始進行。當時一面改削舊稿，一面補充史料，不時往來於歷史語言研究所及本所之間，綠野平曠，雖不覺奔波之苦；半日往返，則頗虛費時光。如此工作至二十九年九月，本所忽又奉令遷徙，工作爲之停頓者又三月餘。

本所四遷四川李莊後，作者健康日壞，勉力支持九個月，始完成全部改稿，即今所刊印者。

如副題所示，本稿主旨在以棉業爲樣本，對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工廠制度之發生，作一個案研究。述史重因果，故一不能編年紀事，二不能萬事齊備，無所不談。故事新編，若徒襲他人舊制，臆口無所論說，讀來有何意味？至所見正誤，訴諸讀者。

本稿取材，除作者南通調查，及自棉業統制委員會所得者外，甚少未經發表之調查記錄。不過蠹餘敗紙中，卻亦頗有發見。如明萬曆會計錄，清同治光緒間各種海關報告冊，皆世所難得者；如諭摺彙存，關抄彙編，華制存考，及李鴻章，張之洞，張謇，左宗棠諸人奏稿文書，皆未經前人採擇者；又如第一次歐戰後我國各海關對各國直接貿易統計，乃本所自關署抄得者，今後恐已不可再得。民國以後有關紗布棉的各種資料，大多見於期刊書籍，分量最多，內容最雜，相互抵牾之處亦最多。我人取用此類資料，首必辨其真偽，條件許可時，必加以修訂校正，如第七章所載棉紗布產銷量及各章所

載歷年紗布機數便是。大抵全稿除第八章第一節手織業存在現勢中所列數字外，其餘皆我人所能審別訂正後之最正確資料。手織業數字，正確程度如何，無法對證，不過我們目的，祇在示明各省有無此業存在，不在據此研完手織業產銷詳情，於理可通。關係國外棉紡織各業的記載，最為難得，在目前情形下，實無法補充。

取材龐雜，使本稿多添蛇足——脚註，其意非在豐贍，實為便於讀者校核訂正。

本稿之作，始終在陶孟和先生指導之下進行；改稿完成後，先生更因親自移譯之便，審閱詳密，教正遂多。誨我嚴師，豈忘銘感？王子建先生乃國內有數的棉業專家，其所作紗廠一章，今已擴為四章，非復舊觀，然其所集資料之一部，則散見本稿中。他人心血，不敢掠美；前驅功績，亦當鳴謝。此外，曾披閱本文初稿者，有友人吳半農，喬冠華諸兄；曾披閱本文改稿者，有友人梁方仲，林興育諸兄，熱心指正，惠我甚多。又，曾供給本文珍貴資料者，有友人梁方仲，湯象龍，鄭友揆諸兄；曾助作者調查南通手織業者有陶元鎬，明學懷，孫金鉞，孫金鈺，季萃，陳明諸君；他如所中各同人，亦予作者頗多匡益，統於此處致謝忱。又本稿所費研究資金，皆太平洋國際學會所資助，亦當誌感。惟文中謬誤，作者自當之，與上列諸先生及學會無涉，此記。

民國三十一年元旦，作者記於李莊門官田。

附言：本書各章附有脚註，書後附錄一為中國紗廠沿革表(1890-1937)，附錄二為各項統計凡二十表，均以目前印刷困難，暫行割愛，祈讀者諒之。

目次

題記	三
第一章 導言	1
一 近百年中國經濟大勢	1
二 棉業與中國經濟	7
第二章 中國之棉業遺產(1839—1893)	17
一 植棉與棉紡織業之分布	17
二 棉工業生產工具	23
三 作為農家副業的棉紡織業	27
第三章 中國國內棉貨市場之開闢(1834—1899)	41
一 英美印三國棉工業革命的發展	41
二 中國之開闢	43
三 中國國內棉貨市場之開闢	43
四 中國棉貨市場之初次爭奪戰	53
1. 英印棉紗	56
2. 英美棉布	58
第四章 中國棉工業革命的發動(1890—1895)	69
一 棉貨市場之開闢與棉工業革命	69
二 幾位先驅者的創業經過	73
1. 鄭官應與李鴻章	73
2. 張之洞與張謇	76
三 先驅者的創業成績及其意義	85
第五章 一個國際商品市場上的棉紡織業(1896—1913)	97
一 中國：一個國際市場	97
1. 中外廠商的負稅輕重	98
2. 英美印日瓜分中國棉貨市場	101

A. 日印棉紗	101
B. 日美棉布	107
3. 英美德日試探中國投資市場	103
二 中國財政之破產與獎勵設廠政策	112
三 華商紗廠擴大再生產過程之成敗	115
四 民族資本蓄積問題初論	120
1. 從官僚資本到產業資本	121
2. 國際競賽中之民族資本	125
第六章 一個國際投資市場上的棉紡織業(1914—1931)	134
一 歐戰與中國棉貨市場	134
1. 日印棉紡織業之新動向與中國棉紗市場	134
2. 棉布市場上日貨霸權之確立	138
二 日本財閥轉變侵華方式	141
1. 從棉布傾銷到資本投放	144
2. 以紡織業為中心之日閥在華投資系統	148
三 華商紗廠擴大再生產進程	154
四 再論民族資本的蓄積問題	157
1. 從商人資本到產業資本	157
2. 外資侵蝕下之民族資本	159
3. 集中現象之發生	165
第七章 棉業蕭條與棉紡織業發展的新動向(1932—1937)	172
一 棉業蕭條的形成與經歷	172
二 蕭條期內日籍紗廠的傾軋及其繁榮	180
1. 中日各籍紗廠的實力對比	180
A. 生產能力	180
B. 生產成本	182
2. 日籍紗廠的傾軋及其繁榮	189
三 蕭條之偏向與棉工業發展的新動向	194
四 三論民族資本的蓄積問題	197

1. 外資壓力之加強與華商的收退	197
2. 從銀行資本到產業資本	205
第八章 棉工業革命中手紡織業之蛻變(1914—1937)	218
一 手工棉紡織業現勢	218
二 手紡織業的存在條件	228
三 手織業生產制度的演進	234
1. 生產制度的進化動力	234
2. 生產制度的演進	236
A. 家庭手織業——商品生產制	236
B. 家庭手織業——工資生產制	242
C. 工場手織業	251
本章附錄 中國棉紗布總產銷量之估計	269
一 棉紗總產銷量的估計	270
二 棉布總產銷量的估計	273
三 棉布輸出入量的結算	275
四 全國棉布總消費量之估計	277
第九章 棉工業革命中新植棉事業之生長(1914—1937)	279
一 原棉生產的商品化	279
1. 棉產商品化的動力	279
2. 棉市的形成	281
二 新植棉事業之生長	286
1. 改良品種	286
2. 推廣棉田	296

中國棉業之發展

(1289—1937)

——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之個案分析——

第一章 導言

一 近百年中國經濟大勢

近百年中國經濟的根本變遷是資本主義的發生。棉業為供給必需品的生產活動，植棉之於耕作，紡織之於製造，在在直接反應農工兩業生產方式的演進，同時也即足以表現全經濟結構之進步的或落後的特徵。本書便取棉業為樣本，窺探近百年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的特殊性。

棉業乃全經濟體系的一個構成部份，為觀察這一構成部份，請先略述近百年中國經濟大勢，以為分析的準備。

十九世紀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久經閉鎖的自給體。這個自給體的中心支柱是小農經濟。百年來中國經濟的新趨向，是自給結構的解體，資本主義的發生與列強侵略勢力的日盛。惟支持今日這殘破局面者，仍以小規模農業經營為主力。

在農業生產技術停留於低級水準的條件下，增加勞動力的消耗，成為農業裏獲取最高產額之唯一途徑。因此，農民因無力經營廣大的農田面積，地主也必以零細佃佃土地為最有利。過去的中國，不論土地所有權已否集中，土地使用權總是極度分散的，土地的利用方式遂成為園藝式的集約經

營。這種集約性小農制度固不能成為資本主義之不可飛越的牢閘，但其對於新生產方式之確立，確曾發生異常堅韌的阻撓作用。

零細分割的集約農耕，把中國全部的經濟活動割成無數的小生產單位。從社會全體看來，這是極端浪費勞動力的生產方式。牠使大多數的生產者不得不緊緊在土地上，而無力從事其他部門的生產活動。於是除去極少數例外，全國的生產工具都分散到農家裏去；分工不能離開男女性別與年齡老幼之生理的標準，協作也不能逃出一個小農家庭的規模。在其本性上，這種小生產體排斥資本之集中與社會的聯合勞動，阻礙勞動分工之過細化與生產工具之改進，一切自然動力與科學成果都無從獲得充分的利用。總之，社會的勞動分工無由發展。

在這種分散孤立的小生產體裏，農業與手工業總是以無比的堅韌力量結合在一起的。食料自然是農民自己的田場所生產的，即工業製品也必努力自種原料，由自己的家庭成員來製造。有許多人人必需的工業製品，其原料並不是家家農場都宜於生長的，但爲了自給，所需有限，農民更有的是勞力，他們不難闢出一小塊田地來盡心護養，以補自然條件之不足。過去中國農民對於棉花的種植，便是一個好例。如此，不獨社會的勞動無由發展，即土地特別適宜於某種作物的優越特性，也難得充分發揮，地域的勞動分工遂亦不得開展。

中國農民爲追求自給，選擇適當的手工業以填補農業活動的閑散季節。因其爲閑散季節的活動，所以他們對於自己手工業產品的估價，幾乎可以不去計較勞動成本。從市場的爭奪上說，這自然是一個有力的武器。但這裏，他們必然碰到一個兩難的境地：爲得賺利，他們可以最低的售價來爭取市場；爲免生活之更加沉淪，他們又必縮減消費，力避購買。世間絕無祇有出賣而不購買的社會，他們的產品又那能獲得廣大的市場？

由於若干特殊的機緣，少數作爲農家副業的家庭手工業，或也能逐漸脫離自給階段，提升爲小商品生產，可是這時小生產者又不得不淪入另一個更深的陷阱——商人的剝削裏去。商品生產的增加，亦即是生產者所受商人剝削程度之增加，終極必至演成手工不足自給，必求助於耕作的局面。於是向之企圖脫離農業以自立者，終不得不重新緊抓着土地。如此，不論手

工業在小生產體的經濟結構上，爲副業，抑爲主業，其在小生產者經濟生活上的意義，祇在支持他最低限度的生活，延長他破產時期之到來而已。所以要使手工業賴直接生產者蓄積資本，使用進步的生產工具，擴大其生產規模，脫離農舍，以進入於工場手工業一途，乃是難得辦到的。商人方面，在市場不能繼續擴大的條件下，自也不會去參加生產活動而自爲場主。這樣，中國手工業乃始終不能從支離破碎的農業附庸獨立而成為自由發展的產業部門。自中國，東洋與西歐各國，十九世紀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國社會，就是上述那樣久經凝滯之龐大的自給體。在這裏，每個農家是力求自給自足的。每個村落是力求自給自足的，每個區域不能充分發揮其自然條件對於某種農作物的優越性，也是力求自給自足的。自給性造成閉關性。這在政治上的表現，對外就成為頑固的閉關政策；對內就排斥工商業的發展，長期地陷入農本主義的泥沼。這樣，欲求中國經濟之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打破政治上的閉關政策與經濟上的自給結構，方有可能。

道光 22年(1842)後，中國政治的閉關政策終爲列強的炮火所打開，經濟的自給結構亦不得不隨之解體。不過，經濟的發展絕不能像政治關係那樣，簡簡單單地決定於幾場戰爭，幾篇條約，急遽而且徹底，且正由於過去組織的強韌，乃使新動向的開展，極爲困難。經濟上，中國是身受比砲火還更慘痛的經歷的。

開關後的中國，先爲列強商品的宣洩市場，後爲列強資本的投放場所，故近百年中國經濟史的演化，實爲一部中國經濟沉淪史。然同時期內，又先有中國手工業對洋貨的抗爭與敗績，後有中國民族資本的發生與長成，故同一階段又成爲中國經濟的進化史。而這兩個主流同時併進，互相作用，互爲因果，而以甲午之戰爲前後兩期歷史的轉換點。甲午以後，中國經濟更趨沉淪。1842年起，歐美先進國在中國取得了自由貿易和協定關稅兩種權利後，以兩種商品向中國傾倒，其一爲機製日用品，其二即鴉片。這兩種商品的流入，前者是以機器打擊手工，後者則以毒藥殺害勞動力，打擊手工，直接破壞中國經濟的基層結構，殺害勞動力則根本毀滅中國經濟的動力源泉。從今日內地尚有洋貨不到之處看來，我們固不能說前一過程業已完成；但據各

種徵象來推測，我們至少可以說早在甲午前後中國自給經濟業已開始動搖了。至鴉片之爲害，直至百年後的今日，猶有流毒，其所給予中國經濟的摧殘，是難以測度的！

理論上，商業的發展必然要導至商品的生產。一個國家自力向外尋求市場的結果固然如此，即被動的輸入洋貨，結果也必如此。中國小農經濟體既不能永久拒洋貨的勢力於鄉村之外，則中國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化之終必發生，乃是極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敢說，中國自給的小農經濟體之破壞，乃是中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前導，經歷儘管慘痛，實也是不可避免的進步步驟。不幸的是，當中國民族資本還不能自立時，帝國主義國家已向中國發動更毒辣的攻勢——資本的投放了。

甲午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投資侵略，可分爲兩方面：一爲各種借款，其目的在獲得種種特殊權益，各自攫取利益範圍，以便瓜分這塊沃土；一爲商工業投資，其目的在建立自己的侵略機杼以便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這兩者同爲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莫大障礙。

甲午以前，中國財政固已艱難，惟收支平衡，尚能勉力支持，所欠外債亦不甚多。馬關條約規定中國應付給日本軍事賠款兩萬萬兩，自此中國乃開始陷入於外債的深淵裏。統計此後十餘年每年應付賠款及外債本息約兩千餘萬兩，佔國家歲出四分之一以上。庚子之役，中國又被迫負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外債再增。每年應付賠款及外債本息達四千餘萬兩，佔國家歲出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鉅量的負擔，真是向中國人民敲骨吸髓了。

一個落後國家，要自力走上資本主義化的坦途，自以國家的力量扶植產業的生長，爲最便捷的途徑。日本資本主義之興起，得力於甲午之戰的鉅額賠款者甚大，便循此途徑，中國方面則與此正相反。甲午以後，中國朝野喧嚷設廠製造，抵制洋貨者，數十年未嘗或已。但政府收入既被賠款與外債吮吸殆盡，則政府之提倡設廠亦祇能徒立章程，作無補實際的空言，至多不過以不值分文的爵位封贈產業家而已。大工程如築路開礦等類，且不得不多賴洋款來舉辦，其結果乃使中國的重工業資源幾於全落入外人之手，而全國動脈之交通事業亦負債累累，大權旁落，既不能有合理的交通政策，更說不上擴張發展。我們固不能說若無這些賠款與外債，中國政府便會以同

等的資力來建立民族工業，但我們可以說因負擔這些賠款與外債，中國由國家資力以求速達資本主義化的境地便絕望了。

各種借款以外，外人又大舉對華投資，其主要部門為航運工廠與銀行等項。外人在華獲有設廠製造之權，始於光緒 21 年 (1895) 馬關條約，航運銀行諸種投資也大盛於此年以後。經濟競爭，決勝於資本之大小。四十餘年來，外人挾其雄厚的財力，已在這些方面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譬如採冶，煤礦以撫順開灤為最大，日英分佔之；鐵礦以大冶本溪湖為巨擘，日寇侵佔之。於是無限富源，任人囊括，國人用煤反不得不求之於洋商；鐵砂運日，授人以殺我之利器，而我一管一釘之微，亦必仰給於歐美。輕工業中，捲烟，棉紗，麥粉，火柴等項部門為規模最大之新式產業，而華商的產量不及總數之半。上海乃全國工廠集中地帶，而動力所需，大半取之外商電廠。論及交通，浩浩長江，本是天賦我優良的內河航路，而日清，怡和，太古各商船佔之勢已成，舳艫千里，莫非外商帆檣。論及銀行，外商的勢力尤其龐大，對外匯市，固向不能為我操縱，即我整個金融政策，亦必賴外人之支援方能決行。總之，四十年來，外人對我投資業已成立完備之系統，步步緊逼，終至使中國經濟淪入殖民地境地。

在上述情形下，中國近百年經濟史的另一個發展方向，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生。

洋貨大量入侵後，中國自給經濟，便開始解體。若干手工業部門之毀滅，其一面的意義為替這些部門闢出建立集中生產的基礎，其另一面的意義也就是使中國民族資本獲得原始蓄積的機緣，由此而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生，乃是必然的結果。我們推源溯流，可知這是由外力造成的。這個外力發動的淵源，構成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的首要特徵。

中國民族工業資本的原始蓄積，是在外洋商品的剝削之下進行的，這個發生過程上的特徵，不獨使牠蓄積數量不能充實強大，且使牠自始便不能作獨立的發展。具體地說，外洋商品在其毀滅中國自給經濟體的方面，固為中國國內工廠之建立，盡了清道的作用；但關稅既不自主，這些商品自仍得繼續入侵，結果向之誘導中國自行設廠者，轉而亦成為中國工廠之勁敵，切奪原料，競爭市場，終使國內工廠常停留在出發點上而不能進行擴大再生

產，以從事資本的增殖。甲午以後，外人對華再作大量投資，於是洋貨之外，加以洋資，民族資本即使能敵過遠道運來的洋貨，也無力與近在咫尺的洋資爭衡。民族資本不獨不能行增殖過程，且常連出發時的規模也不能維持，而終被外資吞併。我們祇要回憶 1914—1918 世界大戰以前，中國新工業發展的遲滯狀況，大戰期中的特殊繁榮及戰後的困苦破產情形，便可確認這是近幾十年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史的基本特徵。

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之另一特徵，為資本市場的畸形發展。

一般說來，銀行資本乃產業資本的附產品，而銀行資本的運用，又足以助長產業資本的蓄積增殖。開關後中國的對外貿易，洋貨未到中國之前，土貨既離中國之後，其金融周轉之利全在外商銀行之手，華商不得分沾。至土貨之販運，洋貨之推銷，則外商銀行又與國內錢莊作成巧妙的結合，——銀行以拆票方式供給錢莊以資本，錢莊則利用牠固有的金融網為外商作買辦，結果儘管貿易數量已相當龐大，新式銀行卻無興起的餘地。甲午以後中國產業資本的發生，歐戰期內，中國產業資本的膨脹，誠然提出新式銀行組織的要求來，惟民國以前，錢莊即利用拆票制度來壟斷這個要求。民國以後，拆票雖已停止，而錢莊的勢力增厚，卒至新式銀行也不得不與錢莊妥協，甚至要假手錢莊尋取資金的投放去路。

錢莊放款，以行幫組織與私人聯絡為手段，以對人信用為法術，得憑舊式合夥經營壟斷新企業金融周轉的大權，其結果：一方面為短期資金市場常在高利貸的影響之下，而不得下落，一方又不能建立票據市場而致資金易於凍結，這是中國金融資本畸形發展的一面。

雖然，今日中國新式銀行確已具有相當的規模了，這主要的關鍵在於內債。

民國以來，政府為彌補歲入，不斷地濫借內債。統計自民元至民十五年間，北京政府財政部實發各種內債凡二十七種，六萬萬一千餘萬元，至國庫證券，各種借款墊款尚不在內。又自民十六至民二十年間，國民政府財政部又實發債券十萬萬餘萬元，各種借款墊款亦不計。若此二十年内中央政府其他部院與地方政府及各特殊機關所發之債券，則難以數計。如此龐大的內債，就其發行目的之多為內戰言，則不啻為統殺新式產業的紀念碑，

就其造成人爲的信用膨脹，以高利促進公債投機言，則更加抬高市場的利息水準，股票市場固無由建立，產業成本也不能得正常的配合，這是中國金融資本畸形發展的又一面。

1931年後，中國勉強獲得關稅自主權，洋貨對中國產業的威脅漸減；銀行界也有了若干進步的徵象，資本市場似將走向正常的途徑；產業前途已露曙光，然外資的侵凌卻也同時緊逼，且不數年間，日本便又興起戰禍，給予中國政治經濟以空前的打擊了。

棉業，這中國經濟上僅次於農業的重要產業部門，就是在上述環境下演進其近百年的歷史的。

二 棉業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自給性之最堅強的基礎，最具體的表現，莫過於衣食兩種生產活動的結合。這種結合組織之最自然的形態是家庭。在中國神話裏，發明耒耜，教民稼穡的是神農；育蠶治絲，創造衣裳的卻是黃帝的后妃嫫祖。所以在中國人的意識裏，耕作是男子的事情，紡織卻是女子的責任。這種觀念成爲中國人無可爭辯的生活規範。譬如中國另一個神話說，住在星河東岸的天帝，生有一女。因她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便邀得天帝的憐惜，而許嫁給河西的牽牛郎；可是又因爲她嫁後廢弛織紉，觸怒了天帝，被天帝責令歸返河東，全年中祇許在七月七日這一天渡河與牛郎相會。(1) 天女之嫁牛郎，表示中國人對於農業的重視；而天父對她的愛憎竟視她織紉之勤惰爲轉移，可知女子紡織的責任，雖天女亦不能或免的。我們若再檢視中國許多高德大儒的家訓，多諄諄以勤習紡織告誡其子女，可知中國人對於紡織看法，實不止於認爲是女子首要的責任，而且認爲是最好的美德。事實上，一個家庭實現了男耕女織，就是實現了原始的分工，縱使把紡織視爲副業，而利用農閑，自衣其力，或有剩餘，可補田產之不足，不獨一家的勞動力從此得有合理的利用，生活上主要的必需物品，也就差可自給。耒耜機杼，遂自然成爲最經濟的自給方法，也就是小生產體之最好組織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不變，男耕女織的分工觀念也絕不會動搖。神話，其實就是人話。

宋元以前，中國衣着原料咸取給於絲麻，屬國間有棉布入貢，祇供皇室玩賞，中土平民是不知有棉花與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國本土始有植棉。⁽²⁾ 所以棉花之成為“女織”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後的事情。惟由於種種原因，植棉與棉紡織技術在中國之傳佈，極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紡織業顯然已成為中國小農家不可或缺的生產業活動，其在中國經濟結構上的地位，亦不過僅次於農業而已。

紡織副業在中國小農經濟體系重要地位之開始喪失，乃是開關以後的事情。

前已言之，開關後歐美先進國以兩種商品向中國傾倒，一為鴉片，一為機製日用品。所謂日用品，即專指棉製品而言，亦不為過。

本來，歐美先進國（特別是英國）的產業革命，最先發生於棉紡織部門，而進展最速，其新技術傳佈至遠東之最早者，也正是這一部門。因此，能夠負擔沉重的運費，遠涉重洋來與中國手工業製品爭勝者，自以棉紡織品為最；而中國隣邦，最先利用新生產技術以至有力向中國推銷的物品，也非棉紡織品——特別是棉紡業製品莫屬。這種情勢決定中國落後生產技術之最先遭受外力侵略，而其所受壓力最大的部門必為棉紡織業——特別是棉紡業。

從進口貿易上考察，開關後四十餘年內中國消費洋貨之最大宗，首推鴉片，其次為棉製品。以發展趨勢論，則以棉製品——特別是棉紗的增加最為神速。據估計，1842年頃中國常年的輸入物品約值二千五百萬元，其中鴉片佔55.2%，棉花佔20%，棉製品居第三位為8.4%。⁽³⁾ 棉花地位之高，乃當時廣東手紡業尚未衰落之故。二十餘年後，棉花地位便被棉製品所取代。按同治六年（1867）全國進口總值69,300,000兩中，鴉片佔46%，棉製品佔21%，棉製品在一切進口物品中已躍居第二位。自此以後，鴉片的進口因中國自種罌粟而日減，棉紡織品則因中國手工業之衰落而進展特速。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進口淨值88,200,000兩中，鴉片得25,400,000兩，棉製品得31,500,000兩，棉製品已以35.7%的優勢壓倒鴉片（28.8%）而居進口貿易的第一位。棉製品這種無上的高位，一直維持了近五十年的時光，1913年纔為棉花所替代。

棉製品進口值與總進口值之比較（五年平均，千關兩）

年 份	洋 貨 進 口 總 值	棉 製 品 進 口 值	棉製品進口總值之%
1874—78	69,294	18,675	27.0
1879—83	80,949	23,357	28.9
1884—88	95,007	32,884	34.5
1889—93	131,639	46,453	35.3
1894—98	189,760	68,141	35.9
1900—03	272,245	107,377	39.4
1904—08	402,468	137,616	34.2
1909—13	479,177	147,057	30.8
1914—18	532,907	154,912	29.3
1919—23	836,765	211,461	25.3
1924—28	1,059,839	186,596	17.6

從絕對數量言，甲午以前中國消費外洋棉製品的價值，雖逐年增高達四五千萬關兩，其後且超過一萬萬乃至兩萬萬餘萬關兩，惟以中國人口之衆，平均每年每人消費洋貨始終不及一元。所以這種進口似乎並不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但我們若將進口棉製品與中國重要出口物品來比較，則可知這久已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開關以後的中國，是以出產絲茶著稱於世界的，幾十年來，中國輸出物品也以絲茶爲大宗。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

我們消費外洋棉製品不多，絲茶兩種出口物品，任何一種都足抵償棉製品而有餘。惟棉製品的輸入日盛，絲茶的輸出，或無進展，或有減退，結果十餘年後，任何一種都不足抵償棉製品的價值；再十餘年後，雖絲茶兩種全部輸出，也不足夠；再十餘年後，絲茶之外加上我們另一種大宗出口物品——大豆，還是不足。這樣到了民國9年（1920）棉製品輸入達246,813,429 關兩的最高峯時，爲了支付這一筆龐大的外匯，要集合我們生絲、茶葉、黃豆、豆餅、桐油、芝蔴、綢緞、豆油、煤、錫、藥材等十餘種重要出口貨的全部收入才能足用！若再將棉製品進口價值和出口總值加以比較，可知我們全國各種輸出物品所售得的外匯要有四分之一乃至半數以上是要拿去支付這筆衣料賬的。而這種情勢的形成也不過三十年內的事情！

棉製品進口值與各類出口值之比較（五年平均，單位千關兩）

年 份	棉製品進口值	土貨出口總值	棉製品出口值			
			當出口總值之%	茶類出口值	絲類出口值	豆類出口值
1874—78	18,675	70,212	26.6	35,121	22,064	*
1789—83	23,857	71,831	32.5	33,079	21,409	*
1884—88	32,834	77,522	42.4	31,033	20,404	*
1889—93	46,458	100,851	46.1	28,429	27,905	*
1894—98	68,741	145,003	47.0	30,712	37,912	2,554
1899—03	107,377	190,595	56.3	24,924	59,257	4,455
1904—08	137,616	248,975	55.3	29,379	64,128	5,499
1909—13	147,657	374,198	39.5	35,110	75,237	21,502
1914—18	151,912	441,140	35.1	35,751	76,238	21,415
1919—23	211,461	633,301	33.2	16,743	119,970	40,450
1924—28	186,508	864,491	21.6	27,038	142,393	94,217

* 總值包括豆餅在內，不錄。

幾十年大量棉製品入侵的直接結果爲手工棉紡織的破壞，而間接的結果，則有大機器棉紡織業的興起。